

福建海洋性格的历史记忆

——泉州宗教石刻

吴梦 王丽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方,素有“东南山区”之称。她西负武夷山脉,东临大海巨涛,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境内群山连绵,林海广袤,是典型的丘陵地带,但境线上却“闽天不长闽海长”,绵长曲折的海岸线斗折蛇行,形成了众多不冻不淤、屏障良好、通海航道优良的港湾。这种山海相随的生态环境给福建的人文带来了独特的景观。

自古闽越人在此择地而居,这里“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①。绵延的丘陵和贫瘠的土地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很早地面对海洋,率先驾舟驭海,探寻海外世界,“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止”^②,把陆地的生存压力转化为海洋的生计发展。秉承先民的传统,福建在她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未放弃海洋,这种以海洋为媒介的生存发展模式,不仅带来山区与海外的经济交流,也带来二者的人文互动。今天被广泛认同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和重商主义”只是福建海洋人文的外在表现,千百年在与海搏斗,和海牵手的过程中,福建人文早已烙上了深层次的海洋性格。这从历代遗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可窥一斑,泉州宗教石刻便是其中之一。

泉州是福建闽南的重要城市,宋元时期的泉州是福建海洋经济最明显最突出的例证。这个曾经“市井十洲人”的万国之都,留下了数百方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石刻,不仅让后人得以感受当时的繁华景象,而且祖先在这里留下了他们鲜明的海洋人文历史记忆。这些宗教石刻既是泉州曾蕃商云集的见证,也是海洋人文的产物,面对它们,谁也无法否认福建海洋性格的历史渊源。

一、宗教石刻的记载,让我们对当时“夷夏杂处”的和谐亲密感同身受。他们与外乡人水乳交融的状态,正是福建“海纳百川”的海洋性格的生动写照。

泉州是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它与亚历山大港齐名,是世界各地商品的集散地。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及各行各业的人等居留泉州,他们在这里从商、为官、传教、游学,甚至繁衍生息,代代相传。泉州当时能成为这样一个吸引世界居民的乐土,除了它的富庶以外,还有他不同一般的人文环境。

保存于泉州艾苏哈卜寺的《重立清净寺碑》记述了泉州伊斯兰教徒,大食国人金阿里出资重修清真寺和夏不鲁罕丁住持清真寺这一史实,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用汉字写就,出自福州人吴鉴之手。吴鉴或受夏不鲁罕丁的委托或受金阿里之托未可知,但他为来自大食国的伊斯兰教徒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碑文却是确定无疑的。无独有偶,在艾苏哈卜寺还有另一方《重修清净寺碑记》也是汉字,由晋江人儒士李光缙写就。家处福建的本地人乐于为来自异域的信教徒撰写碑文,足见他们无任何排外心理,对于异乡人的要求乐于援手,这表现出的是一种怎样的心胸。

在保存下来的200多方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里有几方混杂

有波斯文和汉文,我们不妨作些介绍。这方艾哈玛德墓碑石正面用充满感情的阿拉伯文写着“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③。背面汉文记载“先君生于壬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年三十岁。于元至治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卒,遂葬于此。岁至治二年岁次壬戌七月日,男阿含抹谨志。”^④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异域文化间存在着鸿沟和隔阂,但阿含抹热爱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阿含抹深受中国传统风俗的影响,十分谙练汉文,碑文书写,历法换算都源自中国传统风格。只有在这里得到自由的学习生活,异乡人才能得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铁围山丛谈》记载“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方嚮风广州泉州南请建蕃学”^⑤。所谓蕃学,即授蕃客以其国之文字的学校,或授其以中国文字的学校。可见泉州当时不仅接纳这些蕃客,而且竭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宋元时代,穆斯林蕃客船靠岸,即有舌人(翻译)登船说合,在舌人引导下参加市舶司举行的阅货宴、送行宴。此等舌人便可能为当地蕃学所培养。

奈纳·穆罕默德的墓碑石一面为阿拉伯文,一面为汉文。汉文详细地记下了他的生卒年月,并留下“孤子吴应斗泣血谨志”^⑥。穆罕默德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吴应斗”。黄公墓百氏坟是穆斯林夫妻合葬的墓碑,他特意在墓碑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几个汉字“黄公墓百氏坟”^⑦,有趣的是还给自己取了“黄”姓。伊本·奥贝德拉的墓碑石上刻下“蕃客墓”^⑧三个字。她学着当地人将自己呼为“蕃客”,足见“蕃客”二字在当时并无任何贬义,作为一名蕃客在当地并不受任何歧视。这些墓碑石都告诉我们这些异乡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他们乐于生活在这个开放的城市里。

异乡人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能自由地从商、信教、学习,甚至可以在当地为官,这即便在许多开放的城市也并不多见。在—方波斯文和汉文合一的墓碑石里,记着这样几个字“奉训大夫永春达鲁……”^⑨。其复原应是“奉训大夫永春达鲁花赤”,可见竟有色目人能官至永春县官。还有一伊斯兰塔式墓盖,其上用汉文写着“潘总领”^⑩三字,可见有色目人专掌报御前军马文字。当然,这与蒙元统治时期,蒲寿庚在泉州强大势力的特殊情况有关。但异乡人的势力能在当地扩张到如此庞大,也正是当地人长期对其宽容礼待所至。

当时的色目人不仅不受排斥,而且地位很高,当地人与他们和平共处,甚至水乳交融。“其间有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异俗”(11)。在泉州发现的墓碑石中,有不少是女性,她们可能是跟丈夫而来,也有可能跟随父母,她们也许嫁给了色目人,也许嫁了本地汉人,我们现在已难以知晓,但可以想见二者之间通婚颇乃,才构筑了泉州为数不少的回族后代。这种水乳交融的契合,使泉州人更融入了异质文化色彩,使之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能保持海纳四方的胸襟。

二、数百方不同宗教的石刻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当时的泉州不同宗教和平共处,各自发展。这正是福建海洋心胸的表现,他们乐于接受来自远方的文化,宽容对待不同的信仰。

除了这200多方伊斯兰教石刻,泉州还保留有几十方基督教石刻,300多方印度教石刻,以及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这数百方不同的宗教石刻,印证了泉州多元文化的特质,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各种宗教和平相处,对不同宗教宽容不歧视。

历史上泉州的宗教包括本土的道教、民间信仰和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他们共同并存,交相辉映。

泉州发现元前至元十四年(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故妣二亲郭氏十太孺、陈氏十太孺墓碑,浮雕一个四方等边形十字架,表明南宋泉州已有基督教传播。元代泉州有也里可温寺兴明寺,大德十年(1306年)吴咬哆呢思为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1954年吴文良先生发现的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墓碑,表明14世纪初泉州一带江南各地有过许多景教徒,以致需要设置一位管理明教、秦教(景教)等的教长。

元至元五年(1339年),陈真泽在草庵雕刻摩尼光佛像,其雕刻特征是“佛身道貌”。此像在1987年在瑞典召开的首届国际摩尼教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会徽。元朝摩尼教是合法存在的,由政府任命专人来管理景教、摩尼教徒,这位教长就驻在泉州。明正统十年(1445年),在草庵摩崖上雕刻“劝念 清静光明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12)。它出自《宁万经》,代表察宛(大明尊)和光明、威力、智慧四位一体的概念。

印度教在北宋时传入泉州。临漳门外的石笋可能是印度教崇拜的林加(男性生殖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郡守高惠连认为有伤风化,将它敲断。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印度泰米尔纳杜(马八儿国)人圣班达贝鲁玛获元廷恩准,在泉州建印度教寺院番佛寺。该寺在元末战乱中被破坏。半个多世纪以来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刻300多方,有各种故事石刻、龛状石、神像、神殿台基石、蛇形图案纹石、螺旋状石以及各种形式的柱头、柱础、樑楣、门楣、门框石、须弥座等。

透过这些带着异域文化色彩的宗教石刻,我们仿佛看到雅各在《光明之城》里写到的:“它仿佛不是蛮子人的城市,而是整个世界的一座城市。在这一地区住着穆罕默德教徒,在那一块地区住着法兰克人,在另一个区域又住着基督教徒中的亚美尼亚人,在另一块地区则是犹太人,平安与他们同在;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大印度人,每一块地方又分成几部分,如在法兰克人的居住区有伦巴族居住,非常能吃的日耳曼人居住区和我国人(意大利)的居住区。”(13)“每个民族也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萨拉森人根据自己的习俗,而亚美尼亚人也按自己的习俗,所有其他民族的人无不如此。”(14)

如果说回族及穆斯林在此城市的生存、发展和繁衍是因为蒙元时期阿拉伯势力的壮大,那么中古时期这么多宗教在同一城市的繁荣,体现的则是一种内在深层的人文气度。

三、这些杂糅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宗教石刻,正体现当地人不仅乐于欣赏他人文化,而且善于吸收,敢于创造。这是决不墨守成规的海洋气质。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建沿海早已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地域文化。海洋文化具有显明的个性特点,它开放、流动,具备反抗意识,信奉拼搏冒险精神,崇尚抓住机遇的

能力,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造就了沿海人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敢于冒险,乐于创造,思维天马行空,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禁锢、约束。这种性格特点不仅表现在他们勇闯海洋、广交朋友、大胆从商的大气魄上,更在细微处也无不渗透,仅从泉州宋元时期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便可窥之一斑。

泉州宗教石刻上的雕刻几十年来一直为世界所关注,中外学者试图对石刻图纹图像符号的内容、涵义、性质、墓主身份等相关问题进行破解。这些石刻在历史、艺术、宗教、文化上都透露着丰富的信息,而其最富魅力之处莫过于其上表现着东西文化的碰撞,这正折射出当地人富有创造力的海洋气质。

泉州基督教石刻上的“刺桐十字架”倾倒世界各国宗教史、艺术史、交通史学者。这二十几方刻有刺桐十字架的石碑将当地人大胆创新的精神表现地淋漓尽致。在带着十字架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此教徒居然双手合十,头戴官帽,他胸前的十字架与莲花同在;那个在西方古典雕刻术“带着翅膀的胜利”的天使,居然被当地人披上了僧服,刻上了夸张的耳垂;那些被郑重地刻上十字架的墓碑上,竟有祥云、海水、火焰、莲花座等中国道教和佛教的特征。在不同宗教相互不容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中古时期的人们是怎样才能将完全不同的宗教形式、宗教符号合为一体。

在泉州中世纪,这种表现手法并不独于基督教石刻。在泉州开元寺竖立的两根印度教石柱也广为人知。石刻上的八幅印度教雕刻以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里的故事为原型,它经当地工匠的手表现地栩栩如生,是宗教艺术史上的珍品。有趣的是石柱的下方还有八幅中国吉祥图,表现的是中国人喜好的牡丹、宝相花、双凤戏珠、“爵禄封侯”等主题。

这种完全不同的宗教形式在同一图像上自然融合的现象在其它地方是很少见的。它出现在泉州并非偶然,它不仅是泉州当时多种宗教繁荣并存的物证,更体现了当地人不受羁绊的思维特点、个性特征。他们敢于用自己思维方式、审美角度来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表现的不仅是一种开放的心胸,更是寻找自我的独立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得他们能在古代驰骋海洋,在现代开拓商路,大胆创业。

结论

福建人是最早驰骋海洋的人种之一,福建沿海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存发展的奋争中形成了鲜明的海洋性格,这种性格特征在中古时期便有清晰的物证。泉州宗教石刻便是这种特征的历史记忆。

注释:

①《汉书·严助传》

②《越绝书》

③泉州海交馆基督石刻藏品

④泉州海交馆基督石刻藏品

⑤《铁围山丛谈》

⑥⑦⑧⑨⑩泉州海交馆基督石刻藏品

(11)泉州《荣山李氏族谱·垂戒论》

(12)草庵摩崖石刻

(13)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67页

(14)雅各·德安科纳,《光明之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66页